

# 全球化语境下的身份认同与现代性追寻

——关于聂茂《民族寓言的张力》及其他

慕容怡嘉

(美国加州大学 人文学院, 加州 CA 90089 - 0911)

[摘要] 聂茂先生的《民族寓言的张力》, 站在全球化理论前沿, 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本土文化的具体语境, 借助于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国新时期文学进行解读。其既对各个文学思潮中的经典文本进行“解码”, 又对各个时期创作群体的特征进行“把脉”式的“阐释”, 希望借此获得“历时”的“深度”, 一种“共时”的“广度”, 以及一种立体的“厚度”。聂茂先生通过这种精细解读, 将一堆堆隐藏在材料之下的作品原义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了。在他看来, 中国新时期文学创作群体的共同努力, 不仅冲击了第一世界文化霸权的“自在预想”, 而且修补、充实、拓展和丰富了西方话语体系之本身, 中国新时期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大家庭中有着“不可轻忽”的意义。

[关键词] 聂茂; 《民族寓言的张力》; 全球化语境; 中国新时期文学; 身份认同; 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3)06-0005-06

## Searching for Identity and Modernit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On Nie Mao's *The Tension of National Allegory* and Else

MURONG Yijia

(School of Humaniti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CA, 90089 - 0911 USA)

**Abstract:** *The Tension of National Allegory* by Mr. Nie Mao, standing in the globalization theory frontier,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situation and the native culture of China, uses the western discourse to interpret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new period. It is not only “decoding” of the classical texts of each literature trend, but also the “pulse-taking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eative groups in each period, hoping to obtain a “diachronic depth”, a “synchronic breadth” and a three-dimensional “thickness”. Through this fine interpretation, Mr. Nie Mao displays the original meaning hidden in the piles of materials to the maximum degree. In his eyes, the joint efforts made by Chinese literature creation groups in the new period not only impacted the “free thought” of cultural hegemony in the first world, but also repaired,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western discourse system itself, hence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new period can not be ignored in the world literature.

**Key words:** Nie Mao; *The Tension of National Allegory*;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new period; identity; modernity

自从那个聪明的美国人在研究鲁迅先生的小说时提出了“民族寓言”一说以来, 中国文学批评界

仿佛被人点开了“穴位”, 顿时变得生动起来。在全球化的语境下, 随着民族寓言的层层解码, 大陆学界对身份认同的阐释与对现代性的追寻在思想之舞的镜照下凸现出放射状的精神态势, 各种话语交融在一起, 作家的创作也更加私密化和接近艺术本

收稿日期: 2013-05-28

作者简介: 慕容怡嘉(1946-), 男, 台北人,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 主要从事世界思想史与文艺思潮研究。

真,尽管无孔不入的商业因子带着“与时俱进”的流行色漫不经心地消蚀着文本。

身份认同真的那么重要吗?萨伊德指出:“那种觉得自己祖国亲切的人仍然是一个幼稚的初学者;如果他觉得每一寸土地都是他自己的本土,那他就已经强大起来;但如果他觉得整个世界都是外国国土,那他就臻于完美。幼稚的思想把他的爱固定于世界的一个点;强大的人把他的爱扩展到所有地方;完美的人彻底消除了他自己的国土感。”<sup>[1]</sup>按照萨伊德的这种划分,中国作家、知识分子大多还是人生的“初学者”,他们习惯于根据自己的想象去追逐日益翻新的理论术语,他们关注的焦点不是作为人道意义上的个人内心之诉求,而是需要扶助和启蒙的审美途中的精神他者,他们对爱的奉献也不是建立在作为对理想王国永恒城堡重建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实用的与道德完美相吻合的传统文化的疆域中。由于这种思想的支配,作家、艺术家们对中国的身份认同和现代性的追寻就纠缠于他们“为民代言”与“替集体受难”的苦梦中。

早在1968年,福柯就批评过那种或许至今仍然充当着“大众”的“代言”人、“领导”者的代表性知识分子形象。他认为这是权力潜在的反民主的滥用。因为,在或可称之为“代言的结构”中,权力的实施通过将“已知的事物”变为科学的客体和规训的工具,拓展了自己的统治领域。这种“代言”活化了各种特权主体的意识形态,以及不同的观点以及语言的不同形式,它使意志的某些决定因素具有了权力。福柯指出,民主的时代要求“代表性知识”不再充当权威的“表象”,要求用“特殊知识分子”的反意象来取代它的位置,原因是这些人总是在某一区域同权力进行着局部斗争,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既是为了削弱权力,也是为了在可能的情况下夺取权力。福柯的预言一如杰姆逊的“民族寓言”一样,在中国作家、知识分子身上一再得到验证并留下了深深的思想烙印。

要解释这种“中国特色”必须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语境。聂茂先生《民族寓言的张力——全球化语境下对中国新时期文学还原性解读》一书对此有过深刻而又精彩的论述。该书站在全球化语境下,以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特别是他的“民族寓言”说及其对它的扩展和发挥)为主线,利用国际学术体系的理论架构,如后现代理论(利奥塔的有关

美学说等)、后殖民理论(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等)、克丽丝蒂娃的“文本互涉”论、巴赫金的“狂欢节”和“复调”理论、福柯的“环形监狱”的“主控塔”论、以及赖希的“权威性格”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等等,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发展和血脉因流进行“征兆式”的还原解读。这些学术理论并不是单一的、静止的、孤立的,而是复合的、发展的和相互联系的。例如,克丽丝蒂娃的“文本互涉”理论本来就是直接建立在巴赫金的“狂欢节结构”和“复调”理论的基础之上;福柯的“环形监狱”论对赖希的“权威性格”有着较多的继承和发挥;而福柯的有关学说在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一书中反复提及,其内在影响不言而喻;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现代派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理性资源,无论是赖希的“权威性格论”、福柯的“主控塔论”还是巴赫金“复调理论”和克丽丝蒂娃的“文本互涉”等,一定程度上说,其精神光芒都是秉承弗洛伊德学说的血缘谱系的,它们一起构成了西方现代派理论的内在基石。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则是对现代派理论的继承和超越,而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又是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民族寓言”说也只是杰姆逊在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的精神长廊里自我身份的个体写真,这是该书的突出特点和学术价值之所在。

## 二

约翰·克莱默指出,全球化浪潮下,大家关心的主要问题是知识分子公共立场的消蚀,而不是因其无力面对新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形式而产生的知识分子的背叛,在这些新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形式下,专门知识在逐渐成为技术人员而不是“思想家”的领地,政治决策的定夺和政治道德的构建也都无需听取知识分子的意见,而在过去知识分子曾经是(或者至少他们自己喜欢这样认为)公共领域里重要意见的来源。随着意识形态的终结(至少福山和新右翼之流这样认为),思想家或理论家已经成了多余人,一定意义上,这可以看作是源远流长的西方“现代性”之脉象。

然而,在聂茂先生看来,中国作家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创作者对“现代性”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表现。在王蒙、刘心武等人的作品中,现代性源自一种理想,一种富国强民的强烈冲动和现实诉求;而

在韩少功、张承志等人看来，现代性应该与愚昧决绝，它是一种氛围，一种表征，一种实力与先进文化的共同体；这种现代性到了余华、苏童等人身上就变得模糊和多义，它是首先是一种精神追求，一种对远古优秀文明的继承和发扬光大，同时又是一种家谱，与西方话语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而在残雪、陈梁等人的笔下，谈论现代性无异于谈论鬼怪和荒诞，是一种很有现实意义却又显得虚无和脆弱的事情。

面对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差异，聂茂先生从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出发，试图通过这一时期一个又一个代表性文本的分析以印证“自在预想”的正确性。尽管我对这种还原性“重读”或“解码”颇存疑虑——要在复杂繁纷的境状下剔除个人的爱好和偏见，寻找一种客观的、符合审美想象的真理何其艰难，但无论如何，本人在认真地阅读该部著作后，对论者那灵感的闪动、宏大的视野和野心勃勃的理性剖析之卓越努力表示由衷的尊敬。

聂茂先生在书中多次提及已然存在或潜在的差异理论，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混杂语境，到解构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和历史际遇的文本互涉，作者都有过很好的把握和恰如其分的论述，这是难能可贵的。实际上，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差异理论一向比在欧洲国家更受欢迎，这是因其漫长的移民定居历史使然。这些国家，从地理上讲，不同的种族和部族已经“共存”。精英主义者认为，反对歧视边缘群体的文化多元主义是一种对多数垄断的民主法规的改进，这种垄断曾长期压制除主导历史和文化之外的一切事物，在文化多元主义之下，所有的群体和派别都可以要求得到公正的包容和表达。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他们急于改变被他者认识的带有歧视的个体身份——只有少数成功者通过艰难的努力有幸进入主流话语，但这些人的骨子里仍然闪动着失语的焦灼，他们集体的沉默本身就是要求表达的一种“潜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创作主体一方面尽可能多地承认主体的繁复性和可变性，另一方面是对自我认同的排他主义的重新肯定。前者符合全球化浪潮下典籍化文化语境——按照这种思维，世界被看成是多样性的，非自我中心主义的，人们的身份和文化因子恰恰处于这种多样繁复

的沉淀之中。因为现代性和多元性的内在法则要求人们将自己的种族或身份仅仅视为众多中的一个。如果这种关于平等的限制和规定的要求为“地球村”所有的成员接受，那么多元文化主义将大大促进公平和公正的人类社会的真正实现。

日本学者三好将夫认为：如今的人们很少为了改善普遍的和抽象的人类福利而实践自我约束，特别是当它涉及到有关方面的物质处罚和牺牲之时。此外，以各种范畴的特殊性——从种族到阶级，从地区到发展，从性别到民族，从贫穷到富有，从种族到时代——为前提下的多元文化主义有着无限的变化，甚至在这个跨国流动时代，任何人也只能比较详尽地了解这种多样化中的极小部分。不论多么富有想象力、同情心或者多么关注，人们认识和接受他者的能力都受到严格的限制。观察注定是“来自远方的”。当财富上的差异或差距不断扩大时，跨范畴的理解变得更加困难。同代人碰撞的可能性越少，多元文化主义的呼声也就越高。作为一种自由开明和进步宽容的表达，多元文化主义的抽象原则经常异化成为一种托词，为现存的特权、不平等和阶级差别进行开释。

而在聂茂先生看来，处于压迫和剥削之下的群体，有权利也有责任来保护自己，而为了自我保护，它需要牢固地确立一种群体身份。但不可否认的是：一旦生存和自我保护不再是一种奇缺的必要性，身份政治常常会变成一种自我推销的策略，更确切地说，一种自我服务的销售策略，其中受害的历史成为一种需要付钱的商品。它可以使自己堕落为机会主义和同类相食，无论它是种族的、性别的、国家的、社会的还是其他形式的等等。以多元文化的名义，人们可以把自己的身份作为特权，同时仅仅象征性地承认他人的身份——当需要帮助的场所到来时，人们又对他者不予理睬。这样一来，身份认同俨然变成了一件私有财产，群体——更有可能是它的精英领导者——声称有权拥有和保卫它。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在被统治者当中，排他主义都是破坏性的。

### 三

按照聂茂先生书中的观点，中国文学家们的自我肯定，可以把任何与其他边缘群体可能缔结的政治联盟都分割成不协调的、撕裂的推销运动。可

是,在当今这样以商品化为主导的消费性的网络时代,人们早以消磨了读文时代的求知欲,进入到慵懒的“读屏”作业,文学的意义和它的威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抑制和打压。现在的儿童只要愿意,玩电脑多长时间都行。不过,他们跟印刷文化由全盛走向没落的那个时代里好书成癖的读者,并没有什么截然不同。电脑游戏是另一类虚拟的世界,价值并不低劣。尽管如此,不少人仍然怀念逝去已久的温馨体验:在纯洁空灵的孩提时代,个人的爱恨和向往毫无保留地奉献给文学作品中的那个“虚拟的现实”,甚至有人终生都在许多白日梦和虚构面前卑躬屈膝,反而对“真实的”世界的严肃与执着以及在这一切世界里成就个人的责任漠然置之。

聂茂先生认为,文学发展到读屏或读图的今天,文本的意义是否依然强大而充满力量,这是一个毋须过多讨论的问题。由于作家的文本一旦创作完成,它所描写的那个王国总是先于那部作品本身,正因为此,即使这部作品的所有版本全都毁掉了,那个王国还会继续存在下去。雪莱在《为诗歌辩护》中声称:“在创作时,人们的心境宛若一团行将熄灭的炭火,有些不可见的势力,像变化无常的风,煽起它一瞬间的光焰。”这火焰使诗人变得崇高而充满威严。

尽管当年罗兰·巴特发誓要把作者杀掉,而且运用他智力超群的大脑,竭尽所能地进行了种种理论尝试,但事实证明,他所有的绞尽脑汁都只能是白费心机。因为,相信文学作品之所以具有威严性,是因为作者站在作品后面,确证它的合法有效,并给予它以坚实的基础——这种信念,的确是我们传统力量之中很强的一个组成部分。

聂茂先生认同乔伊斯的观点,认为一个作家能够而且也应该用语言模仿任何东西,以显现他或她至高无上的权威性。这种权威对中国作家的身份认同和现代性来说尤其重要,它延伸了从古希腊悲剧到中国《诗经》的血缘谱系,是文学阀门内在张力的关键点。但这个观点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却有不同的表现。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文学作品意义永不消亡,因为它是对社会现实以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动态的假设的一种准确的再现,它深深扎根于它为之服务的社会现实之中,因而在社会现实之中具有实用性的、实际的功能。文本的正义性并不是来自于这个文本的文字,也不是来自于作家内含的

创造性的力量,而是源自创作者用虚拟手法准确地再现了一个先在的、不以读者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也只有这种再现,才能为别的人开辟出一种潜在的通向灵魂的道路。

换言之,文学作品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意义和神秘的力量,原因在于,它打开了没有别的任何办法可以打开而且也不可能由他者的设计或者阅读行为可以解释的虚拟现实。正是在这个基础上,J.希利斯·米勒坚信:文学威严性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它隐藏秘密,使之永远也不可能被提示出来。文学评论的深层意义恰恰也在这里,这也是聂茂先生创作该书的动力点和发光源。

#### 四

聂茂先生在书中反复强调“现代性”对于中国文学的意义,并提醒学界在深刻把握“现代性”这条主线和西方理论的轴线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并运用这些理论对中国新时期文学进行还原性解读时,一定要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文化本土的具体语境。李欧梵认为,中国的现代性是一种知识性理论附加于其影响之下产生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然后变成都市文化和对于现代生活的想象,然后变成都市文化和对于现代生活的想象。20世纪90年代中国《老照片》之类“怀旧病”的流行,它实质上触及了民族记忆与意识形态。这个时期作家作品中的个体叙事与集体叙事,历史真实与心理感应等拓展了后殖民性问题。<sup>[2]</sup>实际上,对中国具体语境的把握从李泽厚的转变也可以看出,从上个世纪80年代“人类本体论”到90年代的“吃饭哲学”,李泽厚总结了20世纪政治话语和思想文化问题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反省,它也是对西方现代性和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反思。此外,叶维廉对后殖民的语境分析虽然着眼于香港,但隐含中国之意图显而易见,何况香港本身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叶氏认为殖民国与被殖民国之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征服与对抗;二是“同化”和“同化”引起的情结;三是反叛与解放。这都是当代中国的真实语境。<sup>[3]</sup>

因此,对西方各种理论我们不应机械地照搬,更不应全盘“克隆”,而是要站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扬弃和发展。比方,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和文学理论界对“后现代”理论的继续和发扬就是这样的:“后现代”在中国始于改革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

外部世界的感知,而终将落实于更多的中国人在当前对自身历史境遇和文化可能性的意识和探测。因此,“中国后现代”的基本问题是把当代中国不但视为世界“后现代”历史阶段及其文化的消费者,而且也视为这种边界和内涵都不确定的历史变动的参与者和新的社会文化形态的生产者。中国文坛和文学理论界谈论“后现代”不是为了满足这套理论话语的内在欲望,而是要对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做出有效的分析,对自己所处的历史空间进行反思和批判,也就是刘康所说的,“以理论的普遍性话语来透视中国文化的转型期问题,并且反过来再以中国的实践诘问理论的普遍有效性和合理性”。<sup>[4]</sup>这种“诘问”恰恰说明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对西方权威理论不是盲目屈从,而是审视和怀疑,比方,杰姆逊通过分析鲁迅先生的一二个文本就断定中国甚至所有第三世界文本都是“民族寓言”,那么,中国作家要“诘问”的是:难道卡夫卡、福克纳或詹姆斯·乔伊斯的文本就不能读成是第一世界的“民族寓言”吗?有了这种“诘问”和“审视”,就将中国、乃至第三世界长期以来没有主体性、处于“被审视”的“弱者”臣属地位(杰姆逊语)从第一世界文化霸权的“压迫”中解放出来。<sup>[5]</sup>

事实上,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创作群体(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进而延伸到广大知识分子)在对西方话语体系学习和借鉴的同时,总是结合本土的具体语境,对“输入”的理论进行修正、扩充和丰富。例如,西方启蒙话语的最大弊病是社会解体,即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家庭、社群和国家等的撕裂以及伦理价值崩溃、没有整合社会的润滑剂,<sup>[6]</sup>中国知识界在借鉴西方启蒙话语时,看到了其中的“弊病”,<sup>[7]</sup>并自觉运用文化传统中的“和谐精神”进行修补,突出民族主义的“整合力”。但当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被推向极端,成为极权主义的权力工具时,中国知识界又反过来用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个性主义对民众进行“启蒙”,使西方话语既“为我所用”,充实本土的理性资源;又取长补短,丰富西方话语本身,也使得第一世界对中国民族特殊的精神品格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尊重及其“借鉴”和“吸收”。诚如赵毅衡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西方思想的主题,是现代性:先是推进深化现代性,后有反思批判现代性,最后试图代之以后现代性。有趣的是,每一步都起关键性作用的文化人“借鉴”了中国

文化——当然是外行地借鉴。世纪初在各个文化领域中推进现代意识的人,哲学家如罗素、杜威,文学理论家如瑞恰慈、燕卜森,政治学家如狄金森,美学家如傅莱,诗人如庞德、罗厄尔,都对中国文化给予令人感动的赞美,而且认为中国古代哲学、诗学、美学,具有“惊人的现代意识”。一次大战之后,西方文化界的主流对现代性作反思批判。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成为他们批判现代性的重要依据。最早是一批人道主义作家,如托尔斯泰、罗曼罗兰、毛姆,以中国文化的受辱,抨击现代性与殖民主义之间的伦理矛盾;20-30年代,马尔罗、斯沫德莱、休斯、伊文思等作家艺术家,则进而寄希望于东方革命;奥尼尔、杰弗斯,以及50年代出现的“垮掉派”诗人作家,希望在道佛的清虚无为中找到对西方“过分的浮士德精神”的平衡;布莱希特、梅耶霍夫、阿尔陶等人推进的实验戏剧运动,则以中国戏曲为理想舞台,藉以形成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西方思想界从60年代后期,出现剧烈变化。从文化逻辑上,这是上述第二波的自然延伸。一连串的政治事件,主要是越战、中苏对立,以及文化革命,直接推动了新思潮的兴起。存在主义的亲中国精神,在安东尼奥尼、沃霍尔等人手中变成中国图像,在斯奈德、布莱等人的诗中与“深度生态主义”结合;60年代末,法国结构主义突破进入后结构主义,德里达、索莱尔等人,以中国文字/文化传统颠覆西方的逻各斯中心,阿尔都赛、福柯、克里丝蒂娃等人,以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进行言说权力分析。此后,杰姆逊以中国为分析对象,把后结构主义导向后现代主义。<sup>[8]</sup>

## 五

如前所述,聂茂先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站在全球化理论前沿,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本土文化的具体语境,借助于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国新时期文学进行解构,并企图透过这种解构对西方理论本身进行修补和拓展。具体地说,就是对“八九”年以前的“伤痕文学”“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小说”和“新写实”进行重点的文本析义,在对各个文学思潮中的经典文本进行“解码”的同时,又对各个时期创作群体的特征进行“把脉”式的“阐释”,目的在于:

其一是试图获得“历时”的“深度”。如在分析

“伤痕文学”时,将卢新华的《伤痕》(1978)和鲁迅先生的《祝福》(1928)以及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进行“互涉式”解读。这种解读不是机械地照搬克里丝蒂丝的“文本互涉”理论,而是批判式的继承和发挥。比方,文本的分析在诠释了“具体的互涉”和“抽象的互涉”之所指后,对这个理论中的骨架巴赫金“狂欢节”结构进行了拓展,同时,将杰姆逊的“民族寓言”进行了新的补充,指明《青春之歌》和《伤痕》都是一种“成长寓言”。

其二是希图获得一种“共时”的“广度”。如在对“寻根文学”的分析上,就是对韩少功的两篇代表作《爸爸爸》《女女女》进行类比分析。它不仅借鉴于杰姆逊的相关理论,又调动了克里丝蒂娃的“推离”理论和福柯、赖希等人的理论以及后现代、后殖民的有关学说,对同一个作家在同一时期两篇主题相似、而视角完全不一样的作品进行全方位的解码,从中发现文本中强烈的“理性设计”和张扬的“软暴力”的特点,恰恰是韩少功等“寻根文学”作家们在对主流文化精神的深刻理会和把握下所作出的向“乌托邦秩序”之献礼,是中国特殊语境下创作主体既叛逆又妥协的真实写照。

其三是更企望有一种立体的“厚度”。如对“朦胧诗”中的伊蕾组诗就进行了跨时空、跨性别的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有人认为,现代“汉诗”自绝于古典文学,背离了中国传统;反传统和对西方文学的屈从,使中国现代诗丧失了“中华性”,<sup>[9]</sup>并产生出“双重危机”。<sup>[10]</sup>对“朦胧诗”经典文本及其创作群体的解构分析就回答了“中华性”与“世界性”、个人“小我”以及民族“大我”的内在关系。此外,在对“先锋小说”残雪《山上的小屋》解读前,先对“先锋派”作家中两个审美走势完全不同的代表作家马原和余华进行“点击”式的勾勒分析,以及对“新写实”中方方的《风景》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反复释义,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运用西方话语在中国特殊语境下对中国新时期文学进行还原性解读时所企望获得的精神维度。

因此,本书的最大创新点和学术贡献就是:通过对文本“批判式”的精细解读,将一堆堆隐藏在材料之下的作品原义最大可能地呈现出来。同时,透

过这种“解读”得知:中国新时期文学创作群体的共同努力,不仅冲击了第一世界文化霸权的“自在预想”,而且修补、充实、拓展和丰富了西方话语体系之本身,从而使人们更加客观地认识到中国新时期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大家庭中有着怎样“不可轻忽”的意义。

以上,是我在阅读聂茂先生这部学术专著时所触发出来的散乱想象,我捕捉了稍纵即逝的灵感,并立即将它记录下来,原汁原味,交付于此。作为该书的第一个读者,我似乎获得了某种特权,既不需要对特权的给予者表示感激或赞美,也不需要担心自己的想法能不能得到同仁的认同,甚至不用去理会文字的启承转合和文章内在的联贯统一,我只要贪婪地读完它,并且将真实的思想适当地表达出来就行。感谢聂茂先生的信任,使我在领略到他那广阔的视界、激扬的文采、严谨而细腻的阐述的同时,又让我对中国新时期文学发生、发展及其血脉因流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

#### 参考文献:

- [1]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M]. Penguin, 1978: 23.
- [2] 李欧梵. 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J]. 北京评论, 1999(5): 129 - 139.
- [3] 叶维廉. 谈现代——后现代[M]. 台北: 东大图书, 1992: 20.
- [4] 刘康. 全球化“悖论”与“歧途”[J]. 读书, 1995(7): 98 - 105.
- [5] 周蕾. 女妇与中国现代性[M]. 台北: 麦田出版公司, 1995: 85.
- [6] 杜维明. 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76.
- [7] Arif Dirlik, Zhang Xudong. *Postmodernism and China* [M].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53.
- [8] 赵毅衡. 双单向道——对二十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几点观察[J]. 书城, 2002(1): 64 - 65.
- [9] 郑敏. 世纪末的回顾: 汉诗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J]. 文学评论, 1993(3): 5 - 20.

责任编辑: 黄声波